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八三期 ——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602e)

【文革一页】“缔造”和“指挥”的风波	阎长贵
【人物春秋】九届二中全会时的江青	杨银禄
【往事回首】“文革”中周恩来亲自指挥的两次军事行动	耿 耿
【历史一页】东湖风云录（之九）	徐海亮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xwz@cnd.org](mailto:hxw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文革一页】

### “缔造”和“指挥”的风波

• 阎长贵 •

◇ 在 1970 年 7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围绕在军队指挥问题上的提法，陈伯达、张春桥各执己见，争论不休

1970 年 7 月，“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 43 周年所写的社论，题目叫做《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其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走过了四十三年英勇战斗的历程。”

周恩来在 1970 年 7 月 25 日、27 日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篇社论。会上，围绕这句话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伯达主张改回到“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即将“直接指挥”前面的“毛主席和”4 个字去掉。张春桥主张不改，态度非常坚决。康生亦认为新提法不易译成外文。周恩来觉得此事重大，直接涉及毛泽东和林彪，需要由毛泽东本人定夺。他表示：这件事要请示主席。

当时，毛泽东在杭州。7月28日，周恩来将“八一”社论稿送毛泽东审定，同时附信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的情况。汪东兴后来回忆这件事说，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视力模糊。我把总理的信给毛主席念了，他要我代他画圈后退回去。我觉得难办。考虑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就要到上海接见外宾，所以我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我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问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在抽，对着我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把信圈回去。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还说，这类应景文章，既然已经政治局讨论修改过，我就不看了。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毛主席让我删去“毛主席和”4个字，恢复过去的提法。7月29日晚，周恩来返回北京后，将毛泽东的意见批告康生、江青、张春桥等。

细检当年报刊，可以看到，这个新提法，并不是1970年“八一”社论才有的。1969年“两报一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的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其中就这样写道：“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所向无敌的。”当时中央负责宣传的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个新提法？是他们自己所为，还是有人授意？就算是张春桥、姚文元所为，那肯定也是他们认为原来提法（即“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不全面、不符合实际才这样改的。很显然，这绝不是无意识的、不动脑筋的随意行为。张春桥在讨论1970年的“八一”社论时，毫不退让，坚持不改，这又是为什么？他是不是有什么来头？应该认识到，陈伯达和张春桥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绝不仅仅是“文字”之争，也绝不是什么“大秀才”和“小秀才”之间的文人相轻，连周恩来、汪东兴都认为，这是需要毛泽东表态的大事。究竟如何？让我们继续探索讨论。

◇ 所谓“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即“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是怎么形成的

历史表明，这个“一贯提法”，在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上绝不是从来就有的。林彪虽然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当上了国防部长，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但直到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成为“接班人”和中央唯一副主席以前，从没有人把他同毛泽东并列来讲军队的“缔造”、“领导”和“指挥”的关系问题。远的不说，就拿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的情况说吧：

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纪念建军39周年的社论中有这样一句：“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和直接领导的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同日，《解放军报》的社论中说：“毛主席亲手缔造了我们这支军队。”

1966年8月15日（注意：这时林彪已被选为“接班人”），《解放军报》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的社论中仍然说“由毛主席缔造和培养的我们人民解放军”。

1966年11月9日，《解放军报》在社论《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更高》中仍然说：“我们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所不同的是，此社论还高度赞扬，“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榜样”。

由此可以看出，陈伯达所谓“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并不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的。应该说，这是一个“集体创造”，同时也有一个不断“完善”和最后“定型”的过程。我们来粗略地考察一下这个“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形成的轨迹：

1966年11月13日，徐向前在接见军队院校来京串联革命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的。自林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军的战斗力空前加强了。

1966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时说：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为什么这样巩固？靠什么呢？靠的就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由林彪同志主持的非常革命化的人民解放军。

1966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在和叶剑英、陈毅等接见军队造反派时说：我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在林副主席直接领导下……

1967年1月21日，周恩来在接见军队参加地方“四清”的部分同志时说：解放军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在林彪同志辅助下的人民军队。

1967年2月27日，陈伯达在接见原三司部分代表时说：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

由所引这些话可以看出，到这时还没有形成陈伯达所说的“一贯提法”。我们继续往下看：

1967年4月6日，《解放军报》在《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作风》的社论中说：“我们这支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是在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直接领导下……”

1967年4月10日，《解放军报》在《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的社论中说：“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泽东的致敬信中说：人民解放军是您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

1967年4月28日，《红旗》杂志在《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的社论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革命军队。”

1967年5月4日，《人民日报》在《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社论中说：“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来自工农群众的人民子弟兵，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

1967年5月7日，《人民日报》在《一定要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中说：“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的人民军队。”

1967年5月29日，《解放军报》在《拿起笔杆紧握枪，为保卫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的社论中说：“我军是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副统帅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

到这时，“一贯提法”可以说已经基本形成，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1967年8月25日，在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中说：“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和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1967年9月5日，在毛泽东批示“已阅，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林彪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

在军队指挥问题上，所谓“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其形成轨迹和过程大致如此。

◇ 关于军队指挥问题，之所以在“文革”中逐渐形成这样一个“一贯提法”，其原因不是

别的，只是因为林彪的地位上升了

人们可以看到，所谓在军队指挥问题上的“一贯提法”，从其提出和定型都是关乎和阐明毛泽东、林彪同军队的关系的。林彪是开国元勋，是举世闻名的战将，在十大元帅中，虽然最年轻，基于战功，却排序第三，仅次于朱德、彭德怀。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应该说，这个所谓“一贯提法”，是“文革”中吹捧和炒作林彪的一种表现。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和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为了“大树特树”林彪这个“接班人”的权威，由毛泽东发起，对林彪进行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吹捧和炒作。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破天荒地在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上公开赞扬林彪。公报说：“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是空前的。于是，从“文革”初期起，直到九大前后，对林彪的吹捧和炒作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高潮：

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在接见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等13个艺术院校、团体的师生代表时，特别强调确立林彪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意义。他说：“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1966年10月9日，萧华在空军干部会上讲话说：“林彪同志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榜样。我们都应当向林彪同志学习。”

1967年11月21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将《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和通报》稿送毛泽东审阅，毛删去了“‘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中的“和好学生”4个字。这有很深刻的寓意。同“亲密战友”相比，“好学生”的级别、档次显然要低，而只做“亲密战友”的宣传，就不同了，使人感到有平起平坐的味道。

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的新党章草案，明确地写上了“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要求删去这些话。康生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提到他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1969年4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九大全体会议上发言说：“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40年前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周恩来在“文革”中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其中最突出的，恐怕就是这个关于南昌起义的解说。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在谈到南昌起义时说：九大时我有一句话讲错了，讲林彪是光荣代表，应该朱德是光荣代表，首功是朱德同志，林彪是跟上去的。

1969年国庆前后，叶群要当时的政治学院搞了一个《党内两条斗争路线大事年表》。《年表》写道：“在北伐斗争中，我党直接领导的、林副主席所在的独立团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林副主席和毛主席（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由于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深入人心和林副主席的英明

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仍然取得了伟大胜利”；“林副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副主席……有力地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亡国论’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当刘少奇的‘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黑指示发到东北时，立即遭到了林副主席的坚决抵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另外，中央还明确宣布，任何人都不许“攻击诬蔑”林彪。1967年1月13日公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指出：“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和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 在形成所谓“一贯提法”的过程中，似看不出林彪持什么态度，起了什么作用

迄今为止，我没收集到任何一条林彪赞扬这个“一贯提法”的材料。而且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不少事实看，林彪似乎不大赞成过于突出自己。除了上面谈过的外，我们再从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和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等书中举几例：

例一，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叶剑英主持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说：“最近我发现有什么‘林彪同志语录’，是学生搞的，一个是中学校搞的，另一个是一个什么红卫兵组织搞的，我们就收到两种。另外，我们总政过去也搞了我的一个政治工作语录，我看不要搞。你们看到的时候，请你们代为没收。总政，我是给你们讲了。我这个意见是雷打不动的，你们不要搞。”

例二，1967年6月16日，林彪致信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称：“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中，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客观需要和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今后帮助注意掌握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笔者曾写过一篇《林彪不让祝他“永远健康”内情》，见《党史博览》2004年第10期。）

例三，1967年12月13日，林彪致信军委和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再次提出不要宣传他：“特别提出以下各点，盼同志们严格注意：一、不要在街上和刊物中，宣传‘树立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的口号。二、不要出我的语录和文集。三、戏剧、电影、小说中，不要叙述我的革命历史事迹。四、不要呼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五、最近各地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要求我题词的很多。鉴于最近一次题词引起了个别地方两派的纠纷，因此，一概不再题词了。六、应大力突出宣传毛主席和党中央，最好宣传不要提到我。在万一需要提到我时，也无论如何不可超过十分之一的比例。这样才能造成宣传的统一性和集中性。以上各点，盼在营以上干部中印发传达，务必落实。”并要求，“部队发到营以上，地方发到县以上”。

例四，1968年9月9日，林彪晚上出去“转车”（按：这是林彪的一种休息方式），看到北京街头有“纪念林副主席‘八九讲话’发表一周年”一类标语，回来后下令林办工作人员必须连夜把那些标语撕掉。

例五，1968年10月26日，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最后，我想讲一点，就是整个两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领导的，具体执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别

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而我呢，就是没有做多少事。我也不是故意偷懒，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够做多少事情。所以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多，工作也做得不多。但是我在主观上总是愿意跟着毛主席的。我有一点保留的意见，就是这次党章上把我的名字写上，我很不安。”笔者认为，林彪这话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某些问题上，用法律的语言说，林彪几近“不作为”。

根据以上的事实和情况，笔者认为，林彪对所谓“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的形成，似没有参与，也没有起什么作用。换句话说，这个提法与林彪没有关系。有的书，把“这个提法”认定是林彪“急于取得更高地位和权力”的证据之一，恐怕难以服人。

◇ 毛泽东说：缔造就不能指挥呀？胜利后，我没有抓军队，现在我要抓军队了

如前所说，毛泽东是批准和认可了所谓“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的。在他批示“很好，照发”和“已阅，照办”的文件中，都有这个“一贯提法”。为什么九大后，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又表示不赞成这种提法，一再责问：“缔造就不能指挥呀”？我们来看看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在1971年的南巡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说法：

1971年8月27日，在武汉，毛泽东在同刘丰第二次谈话时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1971年8月31日，在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谈话：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又说：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1971年9月3日，在杭州，毛泽东同南萍谈话：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他还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从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一）其矛头明显地指向林彪。但说林彪把“缔造”和“指挥”分开，认为“缔造”不能“指挥”，林彪似乎从来没这样说过——其实即便是提出“一贯提法”的很多人恐怕也不是、也不会这样想。（二）毛泽东已不再相信林彪，也不相信他负责的军队，说“军队要整顿”，提出“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我要抓军队了”等等，都是表明这个意思。（三）说“缔造”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有许多人，这是历史事实；毛泽东这样明确提出来，恐怕是为孤立和反对林彪以争取同盟者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总之，毛泽东关于军队的这些谈话，值得认真玩味。

在这个所谓“一贯提法”问题上，毛泽东在思想上前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即从“文革”初期到九大前的肯定、赞成，到九大后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指责和反对，这和军队在“文革”中的作用以及发展变化有关。毛泽东发动“文革”，需要林彪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支持（所谓“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文革”起来后，特别是“全面夺权”后，全国各行各业一片混乱，唯有军队是一支稳定的力量，毛泽东和中央通过“三支两军”以稳定全国。“没

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一时成为中国最响亮的口号。但是，事物总有两重性。在“文革”发展过程中，军队势力急剧膨胀。九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有21个委员，如果把陈伯达算在内，林彪的势力占了三分之一；在九届中央委员（170名）和中央候补委员（109名）中，军人占49%，接近一半；同时，当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也绝大多数是奉命“支左”的军队干部。当时的中国，颇有“军天下”之趋势。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引用苏联说中国是“军事官僚专政”的话，已表明他对军队势力过分膨胀不满了。

□ 《党史博览》2006年第1期

~~~~~

## 【人物春秋】

### 九届二中全会时的江青

• 杨银禄 •

#### ◇ 不知何处去

江青的保密观念是比较强的。1970年夏季在江西庐山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是毛泽东提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会议要求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内容要绝对保密，连自己的秘书也不准透露。江青对此项纪律是严格遵守的。1970年8月18日下午，江青在办公室里看文件时，打铃叫我。我进去以后，她放下手中的文件，不紧不慢地对我说：“小杨，你现在马上召集我这里的工作人员开一次紧急会议，就说两天以后要到外地去。去干什么？我不能说。到哪里去？我不能说。什么时间走？我也不能说。但是，你们要作好立即要出发的一切准备工作。不要带电影片，不要带书籍，不要带录音机、录音带，要带上我的夹大衣、小大衣和薄的毛衣。虽然现在气候最炎热的季节，但是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刚下飞机时气候非常炎热，然后，越走越凉爽，晚上睡觉还得盖被子，有时白天还穿薄毛衣。那究竟是什么地方，只许你们去想，不许说，不许打听。叫你们准备什么就准备什么，不准对外边的任何人透露任何消息。我的行动是绝对保密的，谁要是泄露秘密我处分谁。你们明天下午4点以前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准备好了立即报告我，然后等待出发的时间，到时候会有人通知我们的。我说完了，你去办吧。”最后她又强调说：“你们准备好了及时报告我！”

我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到门口值班室，请王振荣通知警卫、护士、厨师、司机和值班人员到小会客室开会。人员到齐后，我把江青交代的事情和要求向大家说了一遍，请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作好一切准备工作，明天下午3点以前一切准备完毕，4点我准时向江青同志报告。同志们都知道保密准则，会上谁也没有说什么，开完会大家就分头准备去了。利用下午的2小时，晚上的4小时，就准备得差不多了。第二天上午，我们对准备的物品又一件一件地进行了仔细检查、核对，到中午时分就准备完毕了。下午1点左右，江青起床，到办公室办公时，打铃叫我，问我准备得怎么样了。我说：“正在积极准备，很快就准备完了。”她说：“好，你去吧。”我们已经准备完了，我为什么对她说还正准备呢？一是怕她说我们工作不认真，这样短的时间准备完了，会有怀疑；二是给准备工作留有余地。

下午4点到了，我主动走进她的办公室向她报告：“江青同志，您外出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完毕，您还有什么指示？”江青说：“好，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坚守在电话旁边，等待出发的命令。”

当她说叫我等待出发的命令时，我就立即意识到，党中央要在最近到什么地方召开一次什么重要的会议了。出于保密原则，我不能把自己的猜测对任何人说。我刚回到办公室，周恩来

总理就打来了电话，非常平和地问我：“江青同志这几天休息得还好吧？精神还好吧？”我说：“还好。”总理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明天上午8点到西郊机场上飞机，和江青同志同机的还有文元和法宪同志。关于飞行安全问题我已经向法宪同志交代了，请江青同志放心好了。你听明白了没有？”我回答：“听明白了。”总理说和江青同机的还有姚文元和吴法宪，就更证实了我的判断。

我放下电话就立即把出发的时间和同机的人员报告了江青。江青说：“好，你去告诉我这里的工作人员整装待发吧。”我问道：“这次您外出，工作人员谁去好呢？”她说：“叫大周、小周、小许、老程和司机同志，门口的小同志去两位。去哪两位由你决定。当然罗，你是一定要去的。”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今天晚上不去看电影了，打一会扑克就行了，争取早一点休息。明天早一点起床，我们还赶远路呢。你们也早一点休息，如果明天早晨6点半我还没有醒的话，叫小周叫我一下。”

20日早晨6点，我们外出的和不外出的人员全部起了床，把车辆调度好，整装待发。6点半到了，江青还没有打铃，护士小周轻足慢步地走入她的卧室，发现她睡得正香。遵照她的指示，还是将她叫醒了。醒来以后，她立即问道：“我睡过时间了吧？快点帮我漱口、吃东西，马上出发。”小周说：“您没有睡过时间，刚刚6点半，不着急，来得及。”江青说：“那好，那好。”等她刷牙漱口，吃完饭，才7点10分。因为钓鱼台距离西郊机场比较近，如果路上顺畅的话，15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7点20分从钓鱼台出发，7点40分就到达了机场。下了汽车，我们没有到候机室休息，直接到了停机坪，看见姚文元、吴法宪等在那里。他们二位主动走过来跟江青握了手。姚文元问江青：“江青同志昨天晚上休息得好吗？”江青高兴地说：“休息得不错，要不是她们叫我起床，还真就睡过时间了。”说完，他们就上了飞机。前后顺序是：江青在前，姚文元在中间，吴法宪在最后。

上飞机以后，一位乘务员满面笑容地引导他们进了前舱。前舱设有沙发、扶手椅、办公桌和床铺。他们坐在沙发上喝茶、寒暄了十几分钟以后，姚文元、吴法宪起身要回二等舱，好让江青休息休息。吴法宪说：“今天江青同志起床早，现在休息休息吧，您有什么事再叫我们，我们过去了。”江青没有起身，说：“你们去吧。”姚文元走在前，吴法宪走在后。姚已走出门，吴还没有走出门时，江青问道：“法宪同志，我们到目的地要飞行多少时间？”吴回答：“大约3个小时吧。”说完他也进了二等舱。江青打了一个哈欠，要上床休息了。我和大周就回到了后舱。不一会儿，小周也回到了后舱，并说她离开时江青已经躺在床上。当飞机飞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候，从飞机向下望去，下面山峦起伏，河流似丝带在山下缠绕。小周一边看一边问道：“老杨，今天我们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呀？”我回答：“不知道。”她又问道：“现在是不是快到峨眉山了？你看下面的大山！”我说：“不会吧，峨眉山在四川省，离北京远着呢，两个来小时飞不到吧。”

飞机飞行了3个小时，开始下降，不一会儿，就平稳地降落了。我们在飞机上就看到候机室上的几个醒目的大字“安庆机场”。在飞机滑行的时候，小周问我：“老杨，这是什么地方呀？”我说：“这是安徽省的安庆。”“咱们到哪里呀？”我说：“不知道，是不是要到庐山呀？再等一会就知道了。”

江青、姚文元、吴法宪等人下了飞机，没有进候机室休息，就马上上了一架苏制安-24小型客机，不一会儿就起飞了。飞机飞得比较低，过了一条大江（长江），很快就到了九江机场。飞机落地停稳后，江、姚、吴下了飞机。吴对江、姚说：“你们先走吧，我在这里还要等几架飞机的降落。”江青说：“那好吧，我们先走了。”看来，他们之间还是很客气的。

九江的天气一丝风都没有，闷热难耐，使人喘不过气来。我看到停机坪周围来了不少人迎



接来自北京的人，其中不少人我都认识，大部分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人员、服务人员、司机等。江青的坐车是苏制吉姆轿车，前后还有开道车、随车、机动车各一部。大周和小周上了主车，其他工作人员分别上了开道车、随车和机动车。汽车在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林间的大路上拐了数个弯，旋了数个之字形的路段，就感到空气清新，气候凉爽了。再穿过一个拱门式的大隧道，就到了牯岭街上。

江青住在过去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毛泽东以前来庐山时就住在这里，这一次让给江青一个人居住了，毛泽东住到脂红路175号。

#### ◇ 一身轻松

江青上山以后，精神很愉快，一身轻松。刚安顿好，她就笑着对我说：“请你把老邬请来，我问他一件事。”老邬就是中央警卫处的处长邬吉成。老邬来了以后忙问我：“江青同志找我有什么事？”我说：“今天你不用紧张，她精神好，挺高兴的。”江青见到老邬就问：“主席上山了没有？”老邬回答：“还没有听到主席已经上山的消息。”江青说：“那你现在就乘车下山到九江，找吴法宪了解主席什么时候上山。要特别注意主席的安全问题。”老邬刚下山，警卫值班室就来电说主席已经上山，并到水库游泳去了。我报告江青时，她说：“老邬和咱们一起上的山，现在又叫他下山了，他太辛苦了。”像这样的客气话，我还从来没有听她说过。

当日下午，江青就在姚文元的陪同下参观了仙人洞。她还高兴地向姚文元和随行的工作人员介绍她的“仙人洞”是如何拍照的，摄影机架在什么位置，光圈、速度是多少等等。我们工作人员还在“纵览云飞”的一块大的悬石上照了一张照片。21日，江青和姚文元到含鄱口参观，拍摄了汉阳峰。

22日上午，江青起床以后，微笑着对我说：“小杨，你给我找几块软质的木板和一盒大头针，我要去捉蝴蝶和蜻蜓。庐山的蝴蝶和蜻蜓与北方的大小不一样，这里的蝴蝶个头大、品种多，而且非常漂亮。我要做蝴蝶、蜻蜓标本。研究昆虫也是有趣的一项活动，既转移了精力，锻炼了身体，又增长了知识。”

下午，江青叫上警卫、护士、秘书和服务人员，到她住楼后的山林中捉蝴蝶和蜻蜓。那里树林、竹林茂密，花草丛生，空气宜人。江青和工作人员一起把捉来的蝴蝶和蜻蜓铺展在木板上，用大头针小心翼翼地钉好。她一边制作标本，一边介绍说：“这个叫玉带凤蝶，你们看翅膀下边有两条飘带。这个叫黑蝶，翅膀上的颜色红白相间，这种蝴蝶比较稀少。你们来看看，这个红蜻蜓的样子多么可爱。这些昆虫，我大多数都能叫出名字来，我查过昆虫辞典。”在北京出发的前两天，她叫我找了一本昆虫辞典放在她的办公室里，我发现她的确看过。木板上的十几只蝴蝶和蜻蜓，模样各异，大小不同，色彩斑斓。她的这些“战利品”还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杨富珍等欣赏过，并自我夸耀地向他们详细介绍每只蝴蝶的名称和特点。

#### ◇ 有惊无险

1970年8月25日早上，张春桥打来电话问：“江青同志起床了没有？如果起床了，我想去一下你们那里，我有急事想跟她说说。”我说：“江青同志起床了，我去报告她。”张春桥急切地说：“你快去报告，行与不行，你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电话，请你快一点。”张春桥性格内向，平时说话较少，没有急事他不那样着急。

我放下电话，马上到江青的办公室向她报告。我说：“春桥同志刚才来电话，说有急事想见

您。”江青听了立即答复：“请他快点来，他肯定有急事。”我准备回我的办公室给张春桥回电话，江青说：“为了抓紧时间，就用我的电话给张春桥同志回电话吧。”我给张春桥回完电话，就到走廊里迎候他。没有多大工夫，张春桥就风风火火赶来了。他见到我主动跟我握手，并说：“谢谢你了。”平时，张春桥是不爱跟工作人员说话的，今天是少有的谦虚。我把他带进江青的办公室就出来了，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内容。半个小时以后，张春桥走了。江青打铃叫我进去。见到我，江青霍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大声问道：“小杨，华北组的简报你是送给我了还是压下没有给我？你老实交代，我怎么没有看见？”我回答：“江青同志，我送给您了。”我一边回答一边寻找，一眼就看见文件夹里的那份简报。“江青同志，那份就是。”我指着那份简报说，“刚才王良恩同志来电话说，这份简报要收回去。”江青看到简报心情平静了一些。她说：“你给良恩同志回电话，就说我还没有看，看完了再交回去。”她还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是有人做贼心虚了。”她转向我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如果总理有时间的话，我到总理那里去一下。”我说：“好，我去给总理打电话。”说着我就往外走。她也往外走，准备到大院子里散步，并等待总理的电话。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立即给总理的秘书钱嘉栋同志打了电话。等了一分钟，钱嘉栋回电话说：“总理说请江青同志现在就来。”我放下电话，跑到大院里报告江青说：“小高那里请您现在就去。”当时，警卫员大周也在场。江青高兴地很快上车就走了。

大约过了15分钟时间，大周来电话说：“怎么搞的？主席没有请江青同志到这里来吧？主席马上就要休息了，怎么会叫江青同志来呢？今天咱们非挨批评不可，你也不是不了解她，今天的日子可不好过啦！”我说：“她怎么会到主席那里去了呢？是总理请江青同志去的呀。我不是说小高那里请江青同志去吗？要是主席请江青同志去，我就会说是老高那里请江青同志去呀。”大周说：“在电话里说不清楚，回去再说吧，我们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

周总理的警卫员叫高振普，江青对他很熟悉，见面就叫小高小高的。主席的秘书叫高碧岑，江青对他也很熟悉，见面就叫老高老高的。通常，如果对江青说“小高那里请您去”，她就知道是总理请她去；如果对她说“老高那里请您去”，她就知道是主席请她去。这是不会出错的，今天是怎么了？

我放下电话，害怕极了，也后悔极了。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还是向她实话实说，而决不能说是谎报了军情，只能承认我没有直接说“总理请您去”而是说了“小高那里”，语言表达得不明确，这样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不多作解释，听天由命吧。我想好了，就静静地等待她回来。等着等着，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得出是钱嘉栋的声音，他说：“总理叫我问一下，江青同志怎么还没有来呢？总理等得时间不短了。”我说：“江青同志到主席那里去了，她回来以后，我马上报告她。”钱秘书说：“那好，我向总理报告一下。”几乎是在我放下电话的同时，听到院子里有汽车的声音，是江青回来了。我急忙跑下楼去，小心谨慎地问道：“江青同志回来了？”同时，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她的情绪，看得出她不但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高兴的样子，反而表现出洋洋得意的样子。真是不可思议。她高兴地说：“回来了。总理没有来电话吧？”我说：“总理刚刚来过电话，他请您快点去，他已经等得时间不短了。”她说：“那好，我现在就去。”她没有进楼，就到总理那里去了。江青离总理的住处很近，只隔着一条大马路，坐汽车两三分钟就到了。

江青从总理处回来以后，还是那副高兴的样子，一直没提起莫名其妙到主席那里去的事。26日晚上，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4个人叫到她的住地，向他们通报情况。他们走了以后，江青好像打了胜仗一样高兴。以后，她再也没有说起使我后怕的那件事，直至1973年6月11日她将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并赶出钓鱼台，也没有拿那件事说事儿。如今，那件事已经过去35年了，我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

最近，我看到上海市委原书记徐景贤在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十年一梦》一书，才把那个谜解开。徐景贤是这样说的：“这一天（26日）晚上，我们都集合在王洪文住所的客厅里，交流外出活动的情况。约摸9时光景，有一个穿军装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把王洪文和我叫到客厅门外，轻声说：‘首长请你们去一下，车已经派来了。’……我们跨进客厅，看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个人已经坐在那里了。张春桥的神情比前两天松快多了，他主动招呼我们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并说，‘等一下江青同志要见见你们’。过了片刻，江青出来了……江青自顾自地说：‘25日那天早上，春桥说有急事找我，他带来的那份华北组简报，还是从你们那里拿来的，他自己的一份是后来才查到的。我这里倒是早发来了，可是我还没有看呢！看完简报，我们三个人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一起去找总理。上了车以后，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一直开到主席那儿去了。’……‘主席那天刚要睡觉。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的。’张春桥在一旁补充说。‘是呀，那天可狼狈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脱袜子，刚刚准备睡觉，给我们请起来了。’江青用手势比划着，吃吃地笑起来：‘我赶紧给主席报告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开始时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道华北组出了这样一期简报。’江青说到这里，用手探到她那件浅灰色上装的里襟夹袋里去，掏出一份折叠得方方正正的印刷品，把它展平了在手里扬着，开怀大笑：‘哈哈哈哈哈……喏，这就是这份华北组六号简报。他们要我上交，我就是不交，我说找不到了，我要留着看看。好厉害呀！野心家、阴谋家，两顶帽子，千刀万剐，这就是证据！’‘我们的几份统统交掉了。江青同志这份可以算是海内孤本。’姚文元从旁插话。‘你们要知道，陈夫子后面有几条枪杆子呢！’江青突然故意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以显示她说的这番话十分秘密和重要：‘他们要陈夫子搞了一份马、恩、列、斯、毛关于天才的语录，给几条枪杆子每人发一份。24日那天，他们都充当宣讲员，到各大组去宣讲，所以问题不仅仅出在华北组一个组，各个组都闹得很厉害，因此主席决定休会。……找你们来，是要让你们心中有数，那几条枪，主席已经找他们谈话进行批评了，要相信，任何情况，主席总会有办法处理的。’”

从以上徐景贤的回忆可以看出，江青和毛泽东不期而遇后不但没有指责我们反而很高兴，一是主席对江青不请示、不打招呼就跑来了没有批评；二是江青的话引起了主席的注意和警觉；三是主席给江青透露出要休会，要对“几条枪杆子”进行批评；四是江青知道她要去的方是到周总理那里，但是不知为什么汽车开到了主席那里，没想到收获很大，意外地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歪打正着了。

#### ◇ 春风得意

江青从毛主席那里回来以后，表情既可以用“春风得意”来形容，也可以用“幸灾乐祸”来形容。觉也睡得好了，饭也吃得香了，头也不晕厥了，也不出虚汗了，也很少发脾气了，好像换了一个人。

27日下午，江青起床以后，到办公室看文件，大约看了10分钟的时间，打铃叫我。我进去以后，她很客气地说：“请坐。”我想：“怎么今天这样客气起来了，从她嘴里对我说出一个‘请’字可真的不容易。”

我坐下以后，她说：“我这几天心情不好，有许多使我很为难的事情，又不好对你们讲。就拿叶群同志来说吧，她犯了错误，三番五次地叫我向主席说情。她是副主席、副统帅的老婆，不去为她说情吧，怕林副主席不高兴；去吧，又怕主席怀疑我和她之间有什么关系，将来说不清、洗不净。这件事，实在使我为难，想来想去，我还是硬着头皮见见她，听听她说些什么。”

见不见叶群，她虽然口头上说很为难，但是，通过她的表情，我看得出她的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众所周知，江青与林彪、叶群的关系，既相互吹捧、相互利用，又相互猜疑、相互排斥，

叶群倒霉了，江青自然会高兴，这是不难理解的。

江青说完以后，很快就站起来说：“说不准今天下午叶群同志就会来找我，你出去等她吧。她如果来了，你报告我，我再考虑考虑见还是不见。你去吧。”

好像是她俩商量好了似的。我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以后，大约过了10分钟，叶群果真急匆匆地来求见江青。我猜测她们事先就约定好了会见的时间，如果没有约定，不经江青同意，叶群是不敢贸然来的。

江青的办公室外面有一个暗廊，暗廊里有几把藤椅、几张茶几。我很有礼貌地对叶群说：“请叶主任在这儿坐一坐，我去报告江青同志。”叶群问道：“江青同志休息得好吗？精神好吗？身体也好吧？”我说：“都好。”

叶群每次到江青处，对我们工作人员都很客气，我们也知道，那是看在江青的面子上才这样，所以，我们对她也很客气。另外还因为她是林副主席的夫人，中央政治局委员。叶群说：“麻烦杨秘书，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就说我请求江青同志见见我。你们做秘书工作的知道不少情况，不怕你见笑，我是请求江青同志批评帮助的。谢谢你，杨秘书。”

我说：“叶主任，不要客气，我去报告江青同志，请您在这里等一下。”

我进入江青的办公室，看到她坐在沙发上，紧闭双眼，嘴唇微动。我报告她说：“叶群同志来到这里要求见您。”她听后沉思不语。足足等了5分钟的时间，她才开口说话：“叶群这个人哪！嗨，不说了。”

又等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说：“顾不得那么多了，决定见，你请她进来。”她迟迟不答应会见，是故意端架子，是叫叶群看的，也是叫我看的。意思是：这次是叶群主动要见我的，不是我叫她来的；叫她坐一会冷板凳，体会一下犯了错误的失落感。

她们二人见了面，我就立即退了出来。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会见结束了，江青打铃叫我送客。我看见她们二人肩并肩手挽手高兴地走出办公室。在走廊里，我听到叶群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见了我，使我很受感动，您对我的帮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江青说：“请你回去代我问候林副主席。”

叶群用习惯的动作低头哈腰地说：“一定一定，谢谢江青同志，也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您的身体健康，是我们的福气。”

我把叶群送走了，江青又打铃叫我。我到她的办公室，她眉飞色舞地对我说：“叶群同志这样精明的人，多年在林副主席身边工作和受林副主席的熏陶，竟然也上了陈伯达的当！我看不仅仅是上当受骗吧？哈哈，她也有会犯错误的时候。”

江青沉思了一下又说：“我会见叶群同志的事和我刚才对你说的话，你对任何人都不准说，这是铁的纪律，你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我回答说。

九届二中全会是9月6日结束的。这天晚上，叶群来电话说：“杨秘书，请你报告江青同志，

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他叫我和永胜、法宪、作鹏、会作同志去看望江青同志。江青同志如果精神好，有时间的话，我们现在去看望江青同志。我们等你的电话。”我说：“请叶主任等一等，我马上去报告江青同志。”

我放下电话赶快跑去报告江青。江青略加思索以后，高兴地说：“既然是林副主席派他们来，请他们现在就来，你快去回电话。”

我正要去回电话，她又说：“小杨，你是知道这次会议的情况的，你也知道他们在会上是犯了错误的，受了批评的，中央责令他们作了检查的。他们来了以后，你不要走，听听他们讲些什么，我讲了些什么，以后你可以给我作证，否则，以后我一个人说不清楚，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当然罗，我也不怕，怕的话，我还不见呢。”

我立刻回到我的办公室拨通了叶群的电话，我说：“江青同志说，请你们现在就来。”

叶群高兴地说：“谢谢江青同志，也谢谢杨秘书。”

晚上8点左右，叶群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员大将”来到江青的住地。

江青见他们来了，赶紧站起来，兴高采烈地同他们握手，热情让座，好似久别的战友重逢那样高兴。

江青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太好，本来我要去看望林副主席的，可是林副主席说你们要来，我就没有去。恭敬不如从命，谢谢林副主席，也谢谢你们来看我。”

叶群很会说话。她说：“林彪同志如果知道江青同志要去看他的话，他会很高兴的。当然，是我们应该来看您：一来是向江青同志话别，再有一两天咱们都要下山了；二来是听取和接受江青同志批评帮助的。这次我们在会上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彪同志多次批评我们，说我们头脑简单、发热，起了不好的作用，辜负了主席的长期教导，也对不起江青同志，一定要我们向江青同志好好学习，向江青同志道歉，也请江青同志原谅。”

江青笑着说：“叶群同志，你这话就言过其实了、见外了。你们这次犯错误，我心里也难过，也觉得不是个滋味。我们是一条战壕里并肩作战的战友。这件事是陈夫子搞的，他同春桥、文元同志有矛盾。他们是文人相轻，利用了我们，我们没有及时识破陈伯达的阴谋诡计，上了他的当。我们不能上他的当，接受教训就是了。我们过去是亲密战友，今后还是亲密战友。”

叶群说：“林彪同志讲，江青同志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帮助我们，指出努力的方向，总是给我说好话、做工作，所以要我约他们4位同志一起来向江青同志表示感谢。江青同志虚怀若谷、海纳百川，您不但没有责怪我们，而是热情地鼓励我们改正错误，继续努力为党工作。”这时，叶群转脸去对他们4位说：“你们要牢牢记住今天晚上江青同志对咱们的谆谆教导。”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是。”

江青听了以后，感觉美滋滋的。她说：“我们都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小学生，我们要更好地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听他们的话，就会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我是不折不扣地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所以很少走弯路。”她对黄、吴、李、邱说：“这次你们听信了陈夫子的话，不听主席的话，所以犯了错误，今后主席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你们接受教训，听主席的话就是了。”他们听了以后，连连点头。

叶群觉得谈得差不多了，时间也晚了，就起身说：“谈的时间不短了，别影响江青同志休息。”江青故意摆架子，她说：“小杨，你代我送送他们。”

说到这里，我作为亲历者有一点要说明一下：

我看到有关材料中记载：“江青转过脸来，教训黄、吴、李、邱说：‘这次你们听信了陈夫子的话，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今后，我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决不把你们当外人。……你们听我的话就是了。’”需要更正的是：她没有说“不听我的话”，而是说“不听主席的话”；没有说“我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是说“主席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没有说“你们听我的话就是了”，而是说“听主席的话就是了”；没有说“决不把你们当外人”这句话。江青再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也不会骄傲到那个程度，她始终把毛主席作为唯一的正确者，唯一的支持者，唯一的靠山，她不会自居于毛主席之上。我亲自旁听了那次会见，那几处，江青没有说“我”，而是说“主席”。我现在来说明一下，以还历史的真面目，不说明的话，不符合实际情况。

□ 《党史博览》 2006年第1期

~~~~~

### 【往事回首】

#### “文革”中周恩来亲自指挥的两次军事行动

• 耿 耿 •

（原编者按：原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将军，如今虽已年过八旬，体弱多病，但记忆力却极好，对自己以前经历过的事情记忆犹新。“文化大革命”时期，当造反派蓄谋抢劫解放军的武器仓库、包围国家战略储备油库之时，周恩来总理迅速采取行动，亲自给胡炜下命令，两次指挥、调动解放军有关部队，及时制止了两超重大恶性事件的发生，保护了国家财产和军队的武器装备安全。当时身为解放军某军军长的胡炜，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的这两次军事行动的执行者和具体指挥者。近日，胡炜将军向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文革”开始后的1967年2月15日，原属于北京军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XX军奉中央军委命令转驻兰州军区，由山西进驻陕西，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任务，军部驻地也由太原市移至西安市。

1967年2月22日夜，军部突然接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要求军长胡炜于2月23日晨乘坐专机前往北京领受任务。

1967年2月23日上午，胡炜乘坐国务院派去的专机抵达北京。下了飞机，便驱车前往京西宾馆。此时，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在京西宾馆举行。胡炜由工作人员领进会场后，看到周恩来总理正在讲话。秘书走到周恩来的身边，低声向他作了报告，周恩来朝胡炜看了一眼，继续他的讲话。胡炜找了一个空座位坐了下来。

大约11点钟，周恩来讲完话，会议电就结束了。周恩来站起身，径直朝胡炜走来。胡炜双腿并立，腰杆挺直，以标准的军人姿态向总理敬了一个军礼。看样子，周恩来对于陕西省的局势比较焦虑，也没有另找一个场合与胡炜谈话，就直接给他布置了任务。

周恩来说：“西安现在很乱，大游行、大辩论、大喇叭。西安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你们

部队到达西安以后，要尽力稳定形势。你们要做工作，促使两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现在，西安两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在北京，你先和他们见见面，了解一下情况，做做工作。”

遵照总理的指示，第二天，胡炜先后前往教育部招待所和西藏自治区驻京办事处两地，分别与住在那里的西安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见面，和他们谈话，了解情况。

1967年3月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接见了胡炜以及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刘镇、西安地区群众组织头头等40余人。

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介绍说：“为了稳定形势，中央决定派XX军到陕西省执行‘支左’任务。今天XX军军长胡炜同志到会了。”

胡炜站起身，向周恩来和大家敬了一个礼。

周恩来接着介绍道：“胡炜同志能打仗，能做思想政治工作，能文能武，是我军年轻的军长。XX军到陕西省以后，你们两派群众组织都要支持军队的工作。”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显然是为军队着想，为军队进驻陕西以后能够顺利地开展工作而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和环境。

在谈到陕西省的形势时，周恩来目光炯炯，扫视着在座的40多位群众组织头头。他虽然语气温和，娓娓而谈，但言语之中又透着几分严厉：“你们把西安的形势搞得这么乱，光讲自己正确，光想压制别人，这算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嘛！两派群众组织要整风，大学要搞军训。两派群众组织都要克服自己的问题，要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让生产停顿！”

接见结束以后，胡炜回到了京西宾馆住处。深夜12点钟，他正准备休息，电话铃突然响了。电话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要他马上去人民大会堂，说总理要再次接见他。胡炜不敢怠慢，立刻穿好军装，动身前往人民大会堂。

到了人民大会堂，胡炜看到，除了他，一道参加接见的还有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刘镇、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薛焰。

周恩来先是问了陕西省的情况，接着作了指示，主要内容是现在地方党政机构已经瘫痪，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要组成统一的“支左”领导机构，暂时把全省的工作管起来。要稳定形势，促进联合，抓好生产。军队的负责干部要和群众组织协商，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总理让霍士廉、薛焰和其他一些省、市领导干部出来工作，一面接受批评，一面抓好生产。

说到霍士廉、薛焰等领导干部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能陷到任何一派那里去，陷到那里，不好工作。”

几天内受到周恩来3次接见，胡炜觉得总理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统一驻陕部队（包括省军区、野战军、空军等）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地方和部队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齐心协力，一道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以利于陕西省局势的稳定，迅速恢复生产。胡炜和参加接见的陕西省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对于总理的指示都表示拥护，并表示坚决贯彻落实。

在江青“文攻武卫”和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鼓动下，渐趋稳定的形势重新紧张。一造反派阴谋抢劫解放军武器库，周恩来向胡炜下命令：“你要派部队加以保护。必要时，

可以开枪！”

胡炜军长所辖部队，是中央军委专门派赴陕西省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理所当然地要全力以赴投入此项工作。他们进驻陕西省以后，抽调大批干部、战士组成了几百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厂矿和一些企事业单位。同时，他们把西安交通大学等4所院校的学生集中起来，进行为期1个月的军训。这样，把学生稳定在校园里，减少了对社会的冲击和干扰。通过军训，也加深了学生和解放军指战员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同时，由于陕西省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比较统一，工作得当，陕西省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了下来。

1967年5月下旬，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和胡炜奉命前往北京，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工作。5月24晚，周恩来在钓鱼台16号楼“中央文革”碰头会办公室接见了黄经耀、胡炜二人。同时参加接见的还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在听取了黄经耀、胡炜二人的汇报后，周恩来感到很满意。他首先肯定了陕西省这一段的工作，指示他们要进一步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促使两派联合起来，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成果。他同时还特别指出：“资产阶级派性是很顽固的，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派性膨胀，防止形势出现反复。”

许多同志都以为，陕西省就此可以风平浪静了，不管运动怎么搞，有野战军的一个军在陕西坐镇，至少不会出什么大的乱子。然而他们没料到，不久后，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和王力、关锋为《红旗》杂志起草修改的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神州大地又掀起了一股股恶浪。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团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就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这是第一条。还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

第二天，《文汇报》披露了江青这个讲话的精神。这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好像听到了冲锋号，都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招摇过市，武斗愈演愈烈，逐步升级。

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由王力、关锋等起草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社论说：“我们必须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王力、关锋起草的这篇社论，影响也十分恶劣。社论发表后，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纷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解放军，贴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大字报，冲击解放军军营，殴打部队干部战士，抢劫枪支弹药，甚至公然抢劫解放军的武器弹药库。

1967年8月5日，也就是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社论发表的第四天，西安市的街头就贴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赫然入目，耸人听闻。一派群众组织动



员了数万人上街游行示威，在部队门前静坐。而与其对立的另一派群众组织也动员了数万人上街游行，并高喊口号：“反军乱军，绝无好下场！”

原本矛盾已经得到缓解的西安市两派群众组织，转瞬间就怒目而视，变得不共戴天，水火不容。两派的矛盾逐步激化，并最终于1967年9月2日发生了一起较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幸亏解放军官兵及时赶到武斗现场，才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1967年9月4日，设在西安市的军部总机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来的，说总理要胡炜军长接电话。

胡炜拿起话筒，听到了总理那熟悉的声音。周恩来告诉胡炜：西安市有一派群众组织离开了西安，窜到陕西省某地的解放军武器库附近一带，与当地的造反派组织纠集在一起，企图抢劫那里的武器弹药。

介绍完情况，周恩来以一种命令的口吻说道：“胡炜同志，你要派部队严加保护。必要时，可以开枪！”

如同在战争年代接受战斗任务一样，胡炜双腿并拢，笔直挺立。他手持话筒，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斩钉截铁地说：“请总理放心，我们坚决执行总理的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造反派武斗升级，由大刀、长矛发展到动用真枪、真炮。中央颁布命令：解放军在遇到特殊情况时，“有权自卫反击”。西安市造反派抢劫武器弹药库的企图未能得逞。

在采访中，当听胡炜将军说周恩来总理曾经亲自向他下达过“可以开枪”的命令时，笔者感到非常惊讶。这种极为罕见的现象，不仅仅是笔者，恐怕就连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工作的同志也是闻所未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万不得已的原因促使周恩来用了如此严厉的措辞呢？为了搞清楚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笔者查阅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并作了大量调查。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的武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武斗初期。造反派使用的武器一般是砖头、棍棒、大刀、长矛等，尚属冷兵器时期。二、武斗进行到一定的阶段。此阶段，各地对立的武斗队都想置对方于死地，都觉得原先那么打了不过瘾，于是都想方设法去搞武器装备。

为了弄到真枪真炮，他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基层的人民武装部和民兵组织。20世纪60年代，我国中型以上的国营工厂、农村的人民公社都设有人民武装部和民兵组织，并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所以，最先遭到“造反派”抢劫的是这些基层人民武装部和民兵组织的武器弹药。

当江青“文攻武卫”的讲话和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出笼之后，造反派就开始公然抢劫所在地军分区、省军区、解放军部队的武器弹药。

1967年8月9日，浙江省军区军械一库、二库的武器弹药先后遭造反派抢劫，被抢走的有迫击炮、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枪、信号枪、手榴弹、子弹等。7月底至8月下旬，湖南省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的武器弹药库先后遭造反派抢劫，被抢走的有各类枪支、迫击炮、手榴弹、子弹等。

针对这种严峻的局势，1967年9月5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命令重申：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今后如有违反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日寸，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是反革命行为，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在海防、边防、沿海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人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

命令是1967年9月5日颁布的，也就是说，周恩来总理于9月4日向胡炜下达“必要时可以开枪”的命令时，“九五命令”已经决定颁布了。

胡炜将军在接受采访时，感慨万分地说：“周总理一向做事谨慎，轻易不会下达开枪令。这电是迫不得已啊！这个仓库的武器装备，可以装备几个步兵师，一旦被抢，整个陕西省就要大乱。不仅如此，还会威胁到邻近的省份。周总理给我打过电话之后，又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联络员吴斌同志给西安交通大学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责成他们立刻前去把准备抢夺武器弹药的人员全部撤回来。”

1967年9月4日，胡炜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没有片刻迟疑，马上就向徐保健团长下达了命令，要他亲自率领一个营的兵力，用最短的时间火速赶到该武器库，全面接管武器库的防务。

因为有总理“可以开枪”的命令，部队官兵也就不再缩手缩脚了。部队一到该武器库，徐保健就命令战士们把武器库的防务全面接管过来，里里外外布置了好几道警戒线。他们架起机枪，子弹上膛，并向造反派发出警告：如果有谁胆敢跨越警戒线抢夺武器弹药，解放军就要执行周总理的命令，开枪制止！

在解放军指战员强大的武力威慑下，西安市造反派抢劫该库武器弹药的企图没有得逞。

川陕两支武斗队汇合一处。意图夺取秦岭深处的一座国家战略储备油库。周恩来再次直接打电话给胡炜，命令他马上派部队赶去制止。

1968年5月1日，西安市30万群众在市中心的新城广场隆重召开庆祝大会，正式宣告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瑞山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黄经耀、胡炜等11人任副主任。

虽然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但陕西省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其主要表现就是邻近的省份河南省、山西省、四川省、湖北省的武斗事件持续不断，受其影响，陕西省境内的恶性事件、大规模的武斗事件也在逐步升级，范围在不断扩大，并且有省内外造反派武斗人员互相勾结、互相支援之势。

1968年5月下旬的一天，西安市的军部总机再一次接到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周恩来首先向胡炜通报了一个情况：四川省广元地区一支几百人的武斗队沿宝成铁路窜到了陕西省境内，与陕西省汉中地区的一支武斗队结成一伙，包围了秦岭山脉深处、宝成铁路附近的一座国家战略储备油库。接着，周恩来在电话里给胡炜下达了命令：“胡炜同志，你马上派部队去解决这个问题！”

放下电话，胡炜随即命令驻守在宝鸡市的解放军某师师长孙玉水率领两个营的兵力迅速前往秦岭山脉深处，保护国家的战略储备油库，制止和平息那里的事态。

由于情况紧急，孙玉水接到命令率部出发时，来不及对部队进行动员，拉起部队就走。

那天夜晚，正值下雨。夜色里，秦岭山脉黑云密布，雷电交加。随着一声声短促、急切的口令，6个连队的干部战士踏着四溅的雨水，跑步集合完毕。身穿雨衣的指战员一个个荷枪实弹，神色严峻，在宝鸡市陆续登上了卡车。随着一阵阵汽车发动机的轰鸣，一盏盏汽车前灯如同一把把利剑，劈开雨雾和夜幕，长蛇般急速向秦岭大山里进发。

部队出发之前，孙玉水已给驻守在陕西省略阳县的张文斌团长下达了命令，命令他率领两个连从略阳乘火车向油库所在地进发。两路部队，分进合击。

如今，孙玉水已经去世。笔者采访了现居住在西安市的张文斌。张文斌老团长离休前先后担任过汉中军分区副司令员、商洛军分区司令员。他回忆道：“秦岭大山里有一座大型油库，距离宝成铁路线还有七八公里，火车把油罐车拉到油库附近的一个火车站，再通过输油管道把油输送到油库里。那是从国家战略需要出发，上世纪60年代专门在三线大后方设置的。1968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孙玉水师长突然从宝鸡给我打来电话，命令我率领驻扎在略阳的两个连乘火车出发。两路部队，分进合击。当天夜里我就和略阳铁路部门联系，调来了一个火车头，在后面加挂了五六节车厢。秦岭的公路本来就不好走，那天晚上还下着大雨。孙玉水师长率领的部队走到凤县时，因为雨下得太大，山路泥泞，道路实在不好走，不得不停顿了一下。孙师长在出发前，都没有时间对部队进行动员，他是在凤县对部队进行动员的。孙师长在动员时告诉千部战士们：今晚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任务是什么，对大家提出了要求……离开宝鸡时，那6个连队糊里糊涂的，都不知道师长要带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呢！”

第二天中午12时左右，孙玉水率领的6个连和张文斌率领的两个连几乎是同时抵达油库附近。孙玉水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指挥部队迅速控制了油库，把火车站和油库一带的几个山头都给占领了，占据了制高点，里里外外布置了几道警戒线。

来自四川广元、陕西汉中的两支武斗队，不知道从哪儿事先得到了消息，说是解放军派来了大批部队，昼夜兼程正在朝这里进发，便吓得逃之夭夭了。所以，解放军部队没有和他们发生正面接触和冲突。

在采访快要结束时，我向胡炜将军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周总理是从什么渠道得知四川广元、陕西汉中的两支武斗队包围了那座战略储备油库的？你们有没有向周总理报告过情况？”

胡炜将军摇摇头，回答道：“总理怎么知道的，我不清楚。我们军在陕西省境内宝成铁路一线驻扎有部队，担负护路任务。孙玉水师长、张文斌团长都没有向军部报告过情况，我也没有向周总理报告过情况。事情过后，我也曾经想过。据我后来分析，很可能是油库的领导发现周围突然来了很多造反派的武斗人员，已经威胁到了国家战略储备油库的安全，就通过石油化工部这一渠道向周总理报告了情况。因为这个油库是属于石油化工部系统的。周总理得知消息以后，就给我打电话，给我布置了任务。”

□ 《党史博览》2005年第1期

~~~~~

【历史一页】

## 东湖风云录（之九）

• 徐海亮 •

### 二、文革司令部的变化

以往人们议论武汉文革，人们往往忽略了在武汉66年底的运动深化过程里，中共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发生什么重大转折变动作用；我们在集中回顾了武汉各派群众对于运动的积极作用后，来重新回顾与认识文革司令部的一些变动：其一，是66年11月的工交座谈会的斗争、到12月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特别是林彪关于运动深入的全面、精湛阐述。其二，是陶铸在中央的失势。对于武汉市的运动，对于工业中心城市的武汉，这两点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武汉的群众文革运动才得以彻底地发动起来，也才会有后来的巨大规模、复杂情况和惊人事件发生。

#### （一）12月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

对于工矿企业文革运动是否深入、如何展开，在11月的工交座谈会上出现尖锐辩论、斗争，在毛泽东的主导性批评和支持下，局势转变，陈伯达、周恩来、陶铸相继改变态度，谷牧具体掌握制订的“简报”“汇报提纲”受到批评，陈伯达、王力受命重新草拟“十条”文件。这些，王年一在“工交座谈会的抗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策——围攻谷牧、对陶铸突然袭击、林彪作了极不寻常的讲话”里已详细阐述。只是亲历者王力与他有不同的认识。12月3日到6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工矿“十条”，林彪连续发表长篇极为重要的讲话，周恩来也做了讲话。现摘其中林彪关键阐述，分类罗列如下：

##### 1. 正确认识文革意义问题

“这次大革命是个大批判运动，对全国、全党是个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干部大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搞学术界，现在进入工人、农民，进入全社会，要席卷全国。过去讲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迎接，不是堵，而是要扩大，要渗透到每个领域，要改变社会面貌。要有意识地扩大，深入，发展下去。当然不是放假停工闹革命，精神要永远坚持下去。文化大革命是不能停火的战役，思想革命不能停火，要经常打，长期的打下去，……忽视这个思想上的革命，不是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蜕化复辟到资本主义呢？到底如何变的？我们如何使之不变？我们要很好研究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成功之后，会有反复，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不大清楚，先有了南斯拉夫，后有了苏联，才引起了我们警惕。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化大革命就是。

“我们现在面临两个复辟，一个是美蒋的武装进攻，这个不怕，我们有强大的解放军，有强大的人民武装，我们现在正大力搞后方建设，对这一点我们是有准备的。第二个复辟是和平演变，从现在已有的情况看这是最大的危险，因为很多国家出现修正主义都是通过和平演变来实现的，所以我们更要防止，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把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这样的大民主也使我们老一代受到很大锻炼，没有这样的放手发动群众，没有这样的大

民主，触及不了我们老一辈的灵魂，改造不了我们的旧思想，清除不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影响，只有这样放手发动群众的这样的大民主，才能改造我们的立场、思想作风。现在大民主在进行，我们相信经过这样一次大民主放手发动群众，不但青年一代受到很大锻炼，就是我们这一代也会出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或真正的革命者。我们年青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经过这样大的锻炼，我们就真正有了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的基础。这一场大革命，对防止修正主义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认识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批判的运动，就是对于干部进行一次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在某些意义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这是讲到底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对干部的批判运动。

## 2. 刘邓是50天，还是10年、20年的问题？

“刘、邓、彭、薄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无产阶级路线，刘、邓的错误不是五十天的问题，他们的错误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二十年之多，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多，他们在这段工作时间内，从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们自搞一套，他们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大干扰，在许多重大的关键的问题上，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彭、薄比他们更坏，除了执行错误路线外，还搞两面派，性质更为恶劣。刘、邓、彭、薄，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很深。在工交企业同样如此。影响很深。十年、二十年潜移默化，我们的很多组织、很多干部受到很深的影响。他们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很大干扰。

（按：在6日，周恩来也赞同：“刘邓路线不仅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错误路线不只是五十天，是十年、二十年，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

## 3. 工交战线问题。

“会议暴露了一些思想问题，比原来是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的十条。主要是大破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问题不少，问题也有，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路线，和文教系统不同，第二种观点工人阶级是好的，同知识分子不一样。不打破这种两种观点就不能在工交战线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就是应付，就是被迫革命，不是欢迎革命。

“我们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比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重要？有人认为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没有文教系统的重要，这是不对的。工交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经济命脉。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坏关系很大，如果搞好了，就能把工交企业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如果搞坏了，就能变成修正主义的重要支柱。……我们工交系统有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肯定的回答是有的。

## 4. 革命与生产关系。

“强调革命不等于把时间占得很长，有时占一点也是不可避免的，磨刀不误砍柴工，个别的时候搞六小时生产或占一两天生产时间，可能还需要，但是整个的要坚持八小时，文化大革命时间不能占生产时间更多，要两个兼顾，这两个问题要用不同方法来解决。

“完全从生产上看文化大革命是片面的，我们用别的方法也可以提高生产。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降低生产，如果用生产大小来评议文化大革命成败是大错特错的。生产受一点损失，其他方面得点收获。在政治上得到收获，也是重大的收获。但是我们要注意生

产，文化大革命本来促生产，但在一定时间内某些部分可能挫伤生产。认为失败是不对的。文化革命搞起来，不仅将来可促进生产，一定时间内搞得好的，还可以立竿见影，但搞得不好，可能生产下降。

“革命最重要，革命是统帅，时间安排生产第一，我们强调革命是统帅，但是不能把生产时间占用过多。……单纯强调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落实到生产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单纯的这样认识是不好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成果是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了使人民群众思想革命化，为了发展生产力。它是多方面的，不是单方面的，有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的……所以光从生产一个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片面的……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可能下降。单从生产的下降来评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错误的，因为在政治上的胜利这是更大的胜利。

## 5. 如何对待群众

“……还有一条，你们对开始起来的部分群众怎样看待？是把他们看成‘痞子运动’？还是把他们看成是革命的急先锋？在一般情况下，开始起来的群众是少数，不可能是多数，都是一些受压制的不满的人起来，总是青年人先起来，因为青年人框框少，最勇敢，然后是多数人卷进来，这是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资产阶级革命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一部分人首先主要看他们大方向，看主流，不能过多求支流，因为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批判干部。群众起来既然是向这个方向开火，大方向是对的，就应肯定，缺点也是有的。

“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敢于这样的发动群众，敢于发动这样大的运动，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敢于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敢于搞这样大的运动，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敢于下这样大的决心，有这样大的气魄，只有我们毛主席才能真正相信群众……现在看的很清楚了，我们仅仅九个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年青一代精神面貌完全改变了。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年青一代人材辈出，许多青年就是在这样的大民主下锻炼出来的。如果照刘邓过去一套去作，去办学校，十年二十年也锻炼不出这样的人才来”。

应该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没有真正解决部门和省市领导的思想问题，完全在毛泽东的意料之中。林彪在12月常委会议讲话，再次高度地宣讲了文革运动的深远意义，他用军人简捷的语言通俗地解释“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干部大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特别是提出并非局限于“50天”的问题批判刘邓路线，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彻底解决刘邓的问题，要向文教战线以外的各个战线铺开运动。无疑地，这是转达了毛泽东对形势分析的新精神，正如林彪所言，是“说到底了”。

王力回忆就认为：林彪讲党不能统一领导文化革命，因为文革本身就是对全党的批判，就是批判党的运动，是批判我们这个执政党的革命，“这确实是毛主席的思想”，王力不同意林的“只要革命搞好了，生产受影响也不怕”的说法。林彪的讲话，在12月就开始流传到全国，红卫兵翻印了林彪的主要讲话，反复研讨精神实质，以上引言均成为指导他们、影响今后运动的至理名言。林彪的系列讲话，无疑是在文革中宣讲文革、阐发文革最重要的讲话之一，可惜在后来批判林彪与研究林的时候，大家好象都忽略了1966年12月的系列重要讲话。

周恩来讲。6日会议上，周也发表讲话阐发：“（运动）实际上已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破四旧，立四新；从大中院校发展到小学校，从小学校发展到工厂，学生到工厂同情被压抑的群众，也很快就发展到农村，中间还有一个商业。现在形势已看得出来了，工厂、学校、农村、商业、服务行业、机关、甚至影响到军队。机关会从主要领导机关，由上而下发展到各种专业

性的机关。正如林总说的，运动正在向着广度深度发展。势不可挡，怎么能挡得住！伯达同志说这是革命洪流，是不能堵，不能挡”。迄至11月下旬，周恩来业已看到“火海虎穴与地狱”的前景，退弃了又一扇控制闸门。而且，周承认自己的认识不足：“比如说对红卫兵，我们就认识不够，只准学校搞，不准别的搞，你不叫他红卫兵，他就叫造反队，这还是搞起来了。你不同意，你堵，他用别的名字又出来了，只要你不镇压，就与反动路线有区别，你正在改正错误路线，反对反动路线嘛！你还压嘛？你还压嘛？划清同反动路线的界线，区别就在于压不压的问题，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想通了这一点，就可以改了，他要求组织，先存在了，你不能不承认”。

“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不错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不要满足这些，要有更高的要求。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就有很多的障碍，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障碍是很多的，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

“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回去，三级干部会议绝大部分没有开好，只个别开的比较好，有的没有开成，稀稀拉拉，为什么？就是认识不一致，没有认识到要过社会主义关，没有决心脱裤子，引火烧身，检查自己，有的还拿多数压少数，还组织工人保自己。发生了问题，又把矛盾上交中央。发生问题后，群众一迫，不负责任的什么都签字，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对这么大的革命认识不深，有些城市还发生流血事件，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搞这样一场大革命，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如果不彻底解决，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发生和平演变。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正像林彪同志说的，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所以我们应当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不能不搞，不搞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谷牧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的思想状况，反映了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理解。搞了十条后，找你们谈，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不是孤立的，是有思想根源的……”

“这次开会，我自己没有很好抓，思想上反映很坏，天天反映这个被抓去了，那个被抓去了，大家都有股怨气，这股情绪是不利于搞文化革命的，不如让他们到工厂去看一下，从工人中体验一下生活，不然回去后思想还不通”。

作为实际工作者，周还看到“现在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总之要以积极的态度，有困难要设法克服，有问题要承担责任，不要推卸责任，矛盾不要上交，凡是出了事的，都是领导没有搞好。干部要在群众中过关。极而言之，影响生产是半年吧？革命搞好了，生产会大幅度前进的。只要工作做好了，出乱子就会少，当然不能睡大觉，要兢兢业业，要孜孜不倦，积极工作，矛盾不要上交。要彻底地革命，彻底地解放思想。目前革命还在初期阶段，现在学生几千万，将来会几万万人都要走到大风大浪中去。我们要到群众中去，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主席已作了这个考虑，我们思想要作充分的准备”。

既然周恩来在 1 1 月 2 4 日就公开说了：“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他已经作了最充分的思想准备。

（未完待续）

□ 《东湖风云录》 徐海亮编著 银河出版社，2 0 0 5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